

异化的“她”声

——《消失的爱人》中的话语博弈与性别书写

杨天娇

内容提要 《消失的爱人》是一部叙事独特的美国当代小说，它以两性交替平行叙述展现了两性在婚姻中的矛盾和困惑。本文尝试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方法，对小说叙事文本做出性别化阐释的批评实践，探究吉莉安·弗琳如何通过笔下两性的不同叙事策略来展现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以及建构女性主体与权利，以期揭示这部小说挑战男权体制下的逻辑斯中心主义的女性叙事批评维度。

关键词 《消失的爱人》 叙事 女性主义 主体建构

《消失的爱人》(*Gone Girl*, 2012) 是美国当代女性作家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的第三部作品，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了热烈反响，荣登各大媒体的畅销书排行榜，并于2014年被著名导演大卫·芬奇搬上银幕。这部小说匠心独运，从故事层面上看，弗琳以女性特有的深邃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展现了新时期处于婚姻关系中两性的矛盾与困惑。从话语层面看，它有着独具特色的超文本叙述层和外在指向性，即这是一部具有性别意识的新女性写作文本。本文将运用叙事学的分析工具，从文本的叙事模式、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及其所产生的叙事距离等叙事策略对《消失的爱人》进行性别意义阐释的批评实践，以期探析弗琳创作手法的性别政治含义，探究她是如何使用独特的声音、视角等手段来抵抗父权下的社会意识、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因素对女性话语的限制，从而建构女性身份和话语权威，表达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的批评方法，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纳入同一视域，将意识形态分析与形式分析融为一体，两者的有机结合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维度里，“文本”这一叙事形式被赋予性别属性。1986年，美国学者苏珊·兰瑟(Susan S. Lanser)发表了标志性论文《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①，正式提出了这一理论名称，并首次阐述了女性主义叙

^① See Susan Sniader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in *Style*, 20 (1986).

事学的基本纲领。1989年,以鲁宾·沃霍尔(Robyn Warhol)发表的《介入的性别化差异》^①为标志,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始转向分析叙事话语的性别含义,主要聚焦于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的性别政治,即在性别的文化建构语境下探究叙事形式和性别意识的关联。理论上,作为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扬弃与发展,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内容与形式、伦理和美学紧密结合,它借用了经典叙事学的方法和概念,将叙事学的话语规约和女性主义的政治文化批评相结合,既克服了叙事学崇尚形式、疏离语境的缺陷,又避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观性色彩,体现出跨学科的研究潜力。

一、话语策略的性别符码

“话语”在不同学科里定义不同。语言学里所说的“话语”是语言的形式,社会学家认为话语是社会行动,体现一种社会关系。在大文化语境发展的今天,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和范畴,有着丰富的意义和符号价值。在著名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中,福柯提出了“话语即权力”,将话语赋予“主体间性”,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能界定和管约社会实践主体的力量的权力关系。而语言学界对话语的等级性也早已形成共识,那些代表社会主流叙事的文本不断影响和建构着社会生活,从而形成权威话语。可见,话语不仅仅是用于沟通的语言符号,它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媒介。社会性别身份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重要方面,叙述话语本身又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因而作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载体的叙事话语体现了性别关系模式,并参与到社会性别主体的建构中。性别的符码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参与文本的建构和话语的表述,反之,隐藏在“话语”这一符号权力背后的是性别权力机制、文化身份及各种社会意识,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的话语层面透视性别秩序。无论是在文学的故事层还是话语层,性别特质差异及其性别身份建构都以某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参与进来。简言之,话语是带有明显的性别符码的。在文学作品中,性别因素始终贯穿在文本的各个叙述层,谁在讲?讲给谁听?叙述者是从男性还是女性的视角讲述的?叙述者的声音对其性别身份的建构有何含义?叙述者对现有的社会性别秩序是维护的还是抵制的?作者的性别又是怎样影响了叙事行为的模式?文本的叙事策略又是如何影响读者本人的性别行为?

(一) 叙事声音的性别意识

社会学认为,声音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沉默是一种文化失语状态,发现声音亦

^① See Robyn R. Warhol, *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成为联合国赋权模式的重要内容。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兰瑟认为，“叙述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技巧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社会权利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①。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她阐明了三种叙事声音，即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之后，按照受述者和故事世界的结构位置，她进一步划分了两种叙述模式——公开型和私下型。^②在《消失的爱人》中，作者均赋予男女叙述者以“个人型叙述声音”，即故事的叙述者（尼克/艾米）同时也是故事的主人公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简称主人公叙事。从表面文本看，两人都有发声，都有叙述权利，都有意识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编织自己的情节，但从深层文本看，两者所使用的叙述策略是有性别差异的，二人的叙述被放在了互为参照和对立的视野中。比如在尼克的叙述中出现了大量的不可靠叙事，而在艾米的日记体个人型叙述声音中则出现了多处自由间接引语，这种两性差异化的叙述声音所取得的叙述权威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尼克的叙述布满了扭曲了的事实和感知上的不可靠，出现了许多语言与行动的同质性偏差和自相矛盾，这些内容要么不准确，要么极具迷惑性和误导性。他善于表演，所传达的信息是经过他的思维过滤和再加工的，例如：“通常我都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口，我会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埋在心里，我心中那座地下室藏着好几百瓶愤怒、恐惧和绝望，但人们永远不会从我的脸上猜出来。”^③尼克清楚地知道，他是在给隐含读者讲故事，因此叙述的可信度令人质疑：“此时此刻，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有一个情人，而我将从此失去你的欢心，如果一开始我还讨得了你几分欢心的话。”（《消》：165）当面对警察的审问和媒体的聚光灯时，他伪装成一个深爱妻子的丈夫，“这是我第五次向警方撒谎，我才刚刚开了个头”（《消》：42），这些无不像警钟一样提醒着读者面对的绝非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谎言几乎颠覆了前面的所有陈述，令读者真假莫辨，同时也预先瓦解了尼克在后文叙述的稳定性。此外，尼克的叙述中还存在许多话语行为与隐含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偏差。例如，尼克借妹妹玛戈之口表达了对女性所持有的强烈偏见，“女人全都神经兮兮”（《消》：20），后面，他则干脆直截了当地咒骂：“女人脑子有问题，在这句话中，‘女人’前面不带任何限定词，不是一些女人，也不是很多女人，女人就是脑子有问题。”（《消》：152）这些叙述是明显带有性别意识烙印的，他对性别的理解与评价是带有强烈的偏见的，是刻意而为之而非原

①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② 详见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第201-204页。

③ 吉莉安·弗琳《消失的爱人》，胡绯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42页。后文出自同一作品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本客观地再现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他的话语所表达的性别关系代表着父权社会里的性别等级秩序，其性别立场和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相偏离，甚至是相对立的。文本中还多次出现尼克内心的不安定、自我欺瞒和否定，这些都产生了叙事的不可靠效应，从而抹去了人物，搁浅了意义，消解了权威。

相比之下，在艾米的日记中，她通过个人型叙述声音讲述了她五年来婚姻生活的点滴，展现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婚姻的忠实，表达了她的女性觉醒和抗争意识，并最终完成了她的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追求。艾米通过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从而使她获得了信任并建立了她的话语权威。自由间接引语是西方小说中用于表达人物内心语言或思想的一种重要引语表现形式，它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视角记录事件的，既能完好地保存人物的主体意识，又间接地暗含了叙述者亦或作者的主张和感情色彩，这种双重声音既是人物声音和叙述者声音的融合体，又使叙述者和人物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叙述距离，而张弛有度、若隐若现的距离感不仅带给了读者以审美体验，同时作者的性别意识和政治意图也隐含在形式文本之后。因此，自由间接引语这一话语方式与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的，它渗透着作者权威和性别气质，构成了作者、叙述者和聚焦人物等性别角色之间文本斗争的场所。在艾米的叙述中有许多自由间接引语捕捉、体验着各种不同人物的声音，形成了一支百花齐放、百音齐鸣的多元交响曲，彰显了女性思维细腻的同时也扩大了女性意识的发声空间。在某篇日记中，艾米记录道：“在莫里亚蒂·宾克斯的心里，宾克斯先生确实是一位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不过年轻时她觉得婚姻总是一场妥协，而男人们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女人命中注定要为他们做奴做仆，而她在步入人生终点之时，她才相信女人不必那样坚持坚持再坚持。”

（《消》：141）这不仅表现了传统女性在面临丈夫的不忠时，无不选择了无奈的隐忍与被动的坚守，更是道出了两性在父权文化中的身份地位。艾米通过人物莫里亚蒂的眼光进行讲述，使读者感知到莫里亚蒂的担忧和她想冲出藩篱的朦胧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艾米间接表达了她对传统女性质疑自我价值的否定和同情。她站在女性立场敢于言说“她者”声音，挑战男性权威，道出了新时期女性的心声，表现了女性思想意识的觉醒和不断寻求自我身份的努力。叙述者用这种时有时无的声音，不断向读者灌输她的女性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小心翼翼地建构着女性话语权威”^①。

（二）叙述视角的性别倾向

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性，看与被看是一种

^①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和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权力和身份标志。^①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下，作者所选择的视角模式反映了意识形态和性别权力关系。在传统叙述形态中，叙述视角是男性视野，叙述主体是男性，作品内的女性要经由男性的观看被动地表现出来，而男性在性别叙述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潜意识中长期存在着对女性的“偏见、夸张和欲望化变形”^②，其中深藏了男性的审美标准和伦理判断。到了二十世纪，随着女权的呼声加强，涌现出一批女性主义作家，叙事视角采用的是女性聚焦，当权力被交还到女性手中时，女性由幕后走到前台，不仅女性得以在主动/被动的位置上变换，女性所独有的生命意识和性别意识中的爱和激情也不加矫饰地被叙述出来。而弗琳的《消失的爱人》则独辟蹊径，有意识地进行叙事试验，没有用纯粹的男性或女性单一视角，而是采用男女交叉、平行的叙述视角，一种变换式的有限视角，读者站在叙事者的角度，通过两种对立的视角来感知事件，用叙事者的眼睛和认知来感受事物的发展进程。小说情节内容的起承转合是在男性/尼克和女性/艾米的并列、交替叙述中推动完成的。如果以两人的交替叙述来划分，全书共分为六十三个部分，其中尼克叙述三十二个部分，艾米以日记体完成叙述三十一个部分。作者弗琳在一次受访中曾说过她喜欢在作品中从男女双方不同立场的视角出发讲述婚姻故事，尤其是当夫妻双方彼此不信任时。作家弗琳在呈现当代两性婚姻题材时，采用这种明显的两性之间交替平行的叙述视角到底意欲何为呢？笔者认为，在后女权主义时期，文学文本采取了一种更为迂回、隐匿的方式，有意规避了单一女性视角的“狂欢”，相反，作者刻意交互赋权给两性，起到双声合奏的效果，挑战长久以来的单声叙事，双声得以平等呈现，这符合了新时期男女“平权”的大历史语境的要求。在这样的视角下，作者在作品的叙事层完全隐没，不强行越位介入到他人的叙述视阈，而是保持一种超然的、冷静的、貌似不曾介入的客观再现。而实际上，虽然两者都有视角权，但变换式的有限视角所传达的性别权力关系才是作者意图书写的弦外之音，这一点可以从小说的情节走向和文体风格上看出。小说的叙事结构是双线型的“尼克视角——艾米视角”交替往复呈现，由于他们所叙述的故事时间差，以及各自被赋予的话语策略不同，使得艾米的叙述成为了尼克话语的“解叙述”，尼克的叙述实则是在自我否定和艾米的消解中被解构了，叙述所产生的权威效果也因此被滤掉和消抹，而艾米则完成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自我重塑过程，成为话语

① See Susan S.Lanser, *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9.

② 孙桂《现状与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实践》，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9页。

博弈绝对的赢家，隐含作者的意图不言自明。总之，弗琳在叙述视角上的全新探索与尝试是为了能将女性声音更好地表达出来，在双重性别视角下，井然有序的既有规约系统变得模糊和变形，事物的本质得以重新显现和定义。

二、话语博弈的性别含义

性别的话题是叙事中最常出现的内容，叙事是展示性别和性别关系的重要场域，它参与对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以及两性关系的建构。叙述作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文学的话语表现形式，读者可以通过叙述这一媒介获得对自我及对世界的认知。因此，文学叙事参与了身份主体的建构。而性别认同是人类主体认同的重要基础，所以文学话语与性别主体的建构密不可分。

在父权社会中，在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叙述下，被边缘化的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日益被去情境化和符号化。男性的叙述总是在自我意识的操控下具有逻辑性和说服力，相比而言，女性叙述则显示出“凌乱、不自信和无意义”^①。在婚姻关系中，女性成为了妻子、母亲的所指，是家庭价值的隐喻。在《消失的爱人》中，男主角尼克受父权政治文化的熏陶和左右，认为“屋子里的天使”^②才是女性唯一的合法存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送给母亲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一只熨斗，它摆在厨房的台面上，光秃秃的没有包装纸”（《消》：21）。温柔、贤惠、善良的“家庭天使”是在父权文化意识形态的参照里所推崇的类型化了的女性形象的刻画，是在想象的共同体内把女性定位于一种特定的角色，从而限制了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弗琳的写作视点则冲破了被限制的叙事樊篱，将个体放置于家庭并延伸到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去。当艾米初入婚姻之门时，她便对传统女性价值有着高度的身份自知：“我已经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事物——一名妻子……我已经成为一名妻子，一个让人厌烦的黄脸婆。”（《消》：43）然而，当现实的婚姻与她理想中的爱情越走越远时，艾米则主动出击，精心布局，策划“消失”，与各类群体打交道时都能游刃有余，她从家庭空间、妻子的角色中置换出来，要彻底成为生活的把控者，从而主导自己的人生，这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反女英雄”式人物，挑战了主流社会的心理舒适区域，她拒绝向承载着男权价值观的社会屈服，拒绝成为“他”者凝视下的欲望客

① 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76页。

② Greer Germaine, *The Whole Wo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4, p.39.

体，在与代表父权文化的博弈中逐步建构了自我主体意识和权威。首先，对于尼克所希冀的“酷女孩”和“甜蜜的人妻”身份，最初她是尝试去迎合尼克以获得她的理想婚姻生活的，“男人总是喜欢‘酷女孩’，为了得到他的赞美，我愿意试一试，酷女孩喜欢他喜欢的东西，把他的喜好放在第一位，做所有他喜欢的事情，脸上还带着微笑，从不对他的男人生气”（《消》：78）。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丈夫的不忠终于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她决心要以实际行动给予最有力的反击，从这一点上看，她堪称女性主义斗士，以实际行动推翻一切既有范式和标准，她大声疾呼，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她一定要赢。“你认为我会让他毁了我，自己去逍遥快活吗？不，不可能。他不可能赢，”（《消》：378）“我让他变得更聪明、尖锐。我激励他上升到我的水平。我打造了自己的梦中情人。”（《消》：379）直到最后，艾米终于可以为自己的觉醒与自新举杯庆贺：“我跟商家约好要写一本书：我们的故事终归是由我说了算，这种感觉十分具有象征意义，也十分美妙。话说回来，难道所有婚姻不都是这副模样吗？就像一场冗长的话语权之争？嗯，总之眼下归‘她’说了算，整个世界都会倾听，而尼克不得不露出微笑表示赞同。这样的‘她’会制造奇迹和惊喜……”

（《消》：458）这段叙述申明了女性话语的在场，并带有明显的权力言说色彩，女性身份高度彰显，凸显了女性对话语权威和性别意识的诉求。其次，艾米的抵抗叙事还体现在她对代表着男权文化的父母眼中的乖乖女“了不起艾米”的反讽中。“了不起艾米”身上具备了完美女性的一切美好品格，而艾米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了不起艾米”的范式里，并在这一囚笼下苦苦挣扎，她于父母而言不过是一种象征和影子，是个活生生的完美典范，她的身份是被父权文化所定义的，这也成为了她觉醒和走向自我身份建构的动机与动力。她质疑小时候最爱看的音乐剧《雾都孤儿》里的南希为什么一直对她那个凶暴的男人忠心不二，斥责剧中的唱词“只要他需要我”实则是为家暴和男权谱写的赞歌，纳闷那个自称信奉女权主义的妈妈为什么带她去看这部剧（《消》：299），这样的女性意识在文中多处出现，艾米的成长史就是一个与代表父权价值的“了不起艾米”不断交锋、不断反拨的过程。无论是“酷女孩、好妻子艾米”，还是“了不起艾米”都不过是父权制里“他者”的想象化认同，真实的艾米则要打破这一符号性束缚，实现女性意识的回归和主体性身份的建构。总之，作者跳出父权社会文学成规的圈套，打破了父权社会文化所认同的天使化的类型描述，将女性的异类与反抗有效传达给读者，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颠覆了传统对女性角色的书写规范，呈现的是理想范式之外的女性身份与权力书写，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反话语，是对父权模式下“她者”形象的抵抗叙事。艾米要真正成为“自我”的代言人，成为

自我凝视下的女性主体。弗琳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只是在性别政治关系中，她表现得更加大胆，她打破叙事规约，认为艾米不该接受传统女性本该生性善良的价值观，女性不再也不必令男性如沐春风。她力图塑造一个有目的、有意图、敢于挑战男权话语的“反女性叙述”的“异类”形象，这一形象战胜了男性权威，给予失语女性群体最强有力的“声音”，以女性可能的行动策略，实现女性从边缘到中心的回归，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自此，范式之外的“她者”话语得以被聆听，这无疑有着重要的符号意义。

结 语

综观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安排，一方面，在“故事”层，叙述者在小说营造的多元声音下可以任意穿梭，有助于生成人物和情节。两人的交替叙述是跨越时间不断转换的，这给读者的阅读过程带来障碍，艾米的日记里的“反叙述”不断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使小说悬念重重，读者获得了无限的“快感”和“惊喜”，作品始终保持着叙述的审美张力。另一方面，在超文本的外述层，两性交替叙述完成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女权主义作家弗琳用叙事话语这一权力运作的隐性方式，呈现出来一幅女性主义胜利的图景，体现了她对女性渴求爱、对身份的认可以及对权力的向往的关注。

《消失的爱人》是一部刚刚问世不久的叙事独特、内涵深邃、主题丰富、情节复杂、人物内心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的后现代小说，通过分析话语的性别意义，对作品进行性别阅读和阐释，有助于摆脱以男性为主体的思维模式的限制，以对固化了的性别本体进行戏仿式的解构，从而使得现象有着多重概念的呈现方式，这正是文化多元性的表征。然而，从读者反应论来说，对小说的解读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笔者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了文本的叙事话语层面，小说丰富的文学价值还远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待读者在大文化视野中去挖掘和评述。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风格及其深层动因研究”（WQN2016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
责任编辑：戴潍娜